

看見他們 在我走過的路上，

所謂的「移工」，只是被視野框定的名詞。如果我們能夠把一個人就當成一個人，便能在人身上看到豐富性：這個人背負何種家族故事，又在什麼時候，做出什麼決定？都是人的故事。也就是，最後我們還是要將焦距縮小，縮到個體身上，這些年，臺灣時常看到移工故事，就充分反映這點——即使他們仍被冠以需要同情和理解的眼光和姿態——這些故事將讀者帶進敘事者的視角、貼近移工在異鄉生活的需求、困境和問題，乃至於他們的喜怒哀樂。

文·圖——阿潑 文字工作者

我對移工的關注，起自於東南亞的旅行。作為一個書寫者，旅途中的景緻自會落筆成行，而我又因出身社會科學領域，習於在背囊中收放屬於自己的思考框架，如「結構」或是「流動」這些社會學詞彙，都是我的「有色眼鏡」，不論遇到誰，談了什麼，看見哪些物事，都會在這片鏡框中折射成型，映成一個底定式的風景。

移工，就是我的旅行中無法忽略的見聞。

我第一次對移工產生低度的想像和理解，是在雅加達的鐵道和碼頭邊，我們聘僱的司機指著那蹲成一列、彷彿流浪漢的男人們說：「他們每天都在這裡等工作，有時候，一整天，都不會有份工。」我們聊起工資，談論城市失業率，凡此話題都讓對方不停嘆氣，最後乾脆吞一大口菸，沉默不語。

那天，我在旅行手記裡寫下：「終於了解為什麼印尼人要遠赴異鄉，成為臺灣城市裡的風景。」這話非常淺薄且不負責任，但對當時的我來說，只能泛泛認知：這些人之所以從印尼的車站游移到臺灣的車站，不過都是為了生存而已。

每趟旅行中，我都能和這樣的景色相遇。例如，在菲律賓呂宋島山區路上，我見到「海外雇工」的辦事處，這素色招牌和聘僱資訊在蔥綠平靜的村落中，突兀且畸零，但它恰恰回應了我對這個國家排解自身經濟問題的困惑；我也能在軍政府依然掌控的仰光鬧區，看見無所不在的外語補習班，他們替封閉的緬甸、無力掙脫的人民指引一條希望的路，很多緬甸人學習英語、抵押田地、支付仲介費，到鄰近國家工作，想要改變命運，但怎麼拚命，最多只能買回一塊田地。

聽得更多，閱讀更多，追索更多，就會理解更多，最後，我得到一個論定所有的結論：你我，都是移工的後代，身上都帶著奮力生存的基因。今日的移動或是留學或是旅行，或是全球化貿易，就如同我的書寫

或者文學那般帶了點浪漫性；但過去的移動很實際，無法妥協，就是為了求生：我們的祖先無論是從農村到城市、南方到首都，從貧窮村落跨越黑水溝，或是自窮鄉惡土下南洋……，都和當代的勞力移動狀態沒甚麼差別。甚至可以更苛刻一點，許多被殖民者從非洲運到加勒比海，從中國邊陲送往新大陸，而東南亞四處可見的華人臉孔也都是雇工、農奴的後代。

換句話說，如果放大尺度思考，或許會發現所謂的「移工」，不只是社會學或經濟學的課題，它有歷史的深度，也有哲學的反思。我在自己的遊歷中，嘗試把人放在歷史的卷軸，探問今日「我」的認同和生存問題，或許就能擺脫一種單一形象的身分書寫——被動的、悲情的、缺乏主體性的底層？

說到底，所謂的「移工」，只是被視野框定的名詞。如果我們能夠把一個人就當成一個人，便能在人身上看到豐富性：這個人背負何種家族故事，又在什麼時候，做出什麼決定？都是人的故事。也就是，最後我們還是要將焦距縮小，定格在個體身上。這些年，臺灣時常看到移工故事，就充分反映這點——即使他們仍被冠以需要同情和理解的眼光和姿態——這些故事將讀者帶進敘事者的視角、貼近移工在異鄉生活的需求、困境和問題，乃至於他們的喜怒哀樂。

這些故事，不假外求，也不需要出國探索，就像我龐大的問題意識，透過自己的經驗梳理它：跟大多數臺灣人一樣，移工或家戶雇工是我生活裡

的一部分。已故的奶奶和其他親人需要移工照護，時常進出醫院的我，或多或少得和這些他人的母親、妻子或女兒聊天、打發時間，藉著這層關係，我得到親近且觀察他們的權力。

我時常限縮這樣的權力，只將聊天資訊當成知識背景，因為這些交往僅是讓我察覺自身的不足。例如我必須接連與三四個印尼移工交談，才真正記住這個國家不只有穆斯林——而我已經在她們哼唱聖歌、吃食豬肉等行徑前，發出幾次不得體的驚呼和無知的驚訝。即使素來我以熟悉東南亞文化歷史之名，在文學或媒體圈子取得某些資格，但我卻不得不承認，那是由許多失誤鋪成，我的老師就是這些忍耐各種無知與歧視的東南亞朋友，是他們教會我國土可以有有多大，語言這麼多，人心也能多包容。

例如前幾年臺北火車站發生紅龍爭議，臺灣社會批判指責彼此時，印尼移工社群卻充滿各種委屈和訝異，因為他們這才知道原來習慣和文化對他人造成了困擾，於是，彼此督促砥礪：「千萬不可以製造垃圾，不可以為別人帶來麻煩。」他們在網路上傳了一句印尼諺語：「不論站在哪塊土地上，都要守護這塊土地。」而我將這句話寫進報導裡。

比起旅行，在媒體工作那些年，才是我對移工議題著力最深的時期。如上述提到的臺北車站紅龍事件發生時，我和同事從北走到南，探討移工空間分布的問題，這種差事不算簡單，首先得找到人、發現場域，待一切都解決後，還要克服語言的差異。然而，報導完成後，成就感就非常，對我來說，過往那些巨大而抽象的探索，彷彿在自己的土地上獲得根底，我終於得以攀著豆蔓的根莖向外延伸。換言之，在東南亞的那些漫談，要回到自己的故鄉，才長出一個我能確切理解的模樣；當我知道異鄉人怎麼來到這裡，如何看待這裡的生活，也就明白我所



在菲律賓看到的徵人廣告。



筆者與移工參加抗議活動。

熟悉的這個社會怎麼與這些文化、這些陌生互動。

記者的身分、權利，與這工作所背負的責任，才是真正引領我進入核心的關係。我的觀看和書寫，不再停留在漫遊式的探索上，而是確實的一把尺、一副眼鏡，好面對當下現實的處境。每個人在各種階級、國族、性別、生命等層面，都有必須面對的，屬於人的處境。

例如2013年，廣大興事件發生，這個社會瀰漫著無法控制的仇恨氣氛，足以扭曲「臺灣最美的風景」。傳聞汨汨流出，很多都是移工被打、被欺負的消息。報社因此派我和同事四處採訪，我在蘇澳漁港靜靜走著，試圖親近每一艘漁船，和船長、漁工攀談，但這些黝黑又善良的面容在我提到「菲律賓」時迅速凍結，成了僵硬冷漠的臉：「不要打擾他們，跟他們沒關係。」他們將我們推了出去，聲聲強調：「跟他們沒關係。」

我到了菲律賓移工慣常聚集的小吃店，老闆娘熱情好客，善於談天，但同樣在我小心翼翼地提起採訪之事時，她立刻結冰：「不要欺負他們，跟他們沒關係。」我知道大眾對媒體的觀感不好，總以為記者都是來挑撥離間、無事生非，於是耐心解釋採訪目的，釐清誤解。老闆娘仍不為所動，跳針似地說著：「不要欺負他們。」

「他們不過就是艱苦人。」她說：「艱苦人，要疼惜艱苦人。」

這段採訪經驗，與當時社會和媒體所傳播的氣氛差距如此之大，彷彿平行世界，讓我嘖嘖稱奇，卻也反思：透過報導或書寫所放大的現象或事實，是否真能反映、解釋、說明什麼？最終，我也只能靠自己，一步一步地探索，一點一點地追問，一篇一篇的書寫來呈現部分真實，即使這樣的真實，是透過我的尺、眼鏡所折射的風景。

這也是我為何總是在路上的理由，也是我必須將書寫置於某種議題脈絡，否則無法成立的原因——不論這尺有多長，時間有多遠，最後都必須反覆論證，用現在的自己反駁過去的自己，讓今天的移工書寫不置於落於一永恆印象的移工書寫。

去年底，我又到菲律賓，同樣在窮鄉僻壤看到無止盡的海外工作招牌和廣告，它散落在公車亭或電線桿上，我在這個國家時間多長，走得有多遠，這些訊息就跟著我多久。我在路邊吃飯，人們對我說他的親人在臺灣，在農村探訪，老人說他的兒子在臺灣中壢，菲律賓之於我，並非只是絕對的移工產地，但臺灣之於他們，卻像是只有一個印記：我的親人在那裡。

這時，我已有足夠的認識基礎，理解這個國家的整套移工歷史和政策，卻還是問：「他們在臺灣過得好嗎？」

「很好，女士，他們過得很好。臺灣善待他們。」

我笑了笑，心裡卻浮現一個聲音：「先生，不都是真的，是部分事實。」

但我沒說出口，一如我不會寫下這段經歷，因為，當我繼續往遠處走，到城市去，我又聽到了不同的移工，發現另外一種移工故事。這些聽聞讓我那麼篤定自己真的瞭解菲律賓，清楚這些移工的掙扎與出走的原因，太過複雜，甚至需要多於一本書的篇幅。最終，我們都要坦承，我們需要旅行，需要追索和探問，讓我們得到更多部分真實，而這是移工教會我的事。✕